

新文学

第三辑

 大象出版社

新文学

第三辑

主 编

陈飞 张宁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 第3辑/陈飞,张宁主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5. 2

ISBN 7-5347-3661-7

I. 新... II. ①陈... ②张... III. 文学研究—中国
—文集 IV.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9012号

出版人 李亚娜

策划人 耿相新

责任编辑 吴韶明

责任校对 钟 骄

封面设计 秘金通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25号 邮政编码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郑州艾乐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制版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54千字

印 数 1—2 000册

定 价 29.6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231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6202901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委 员	王富仁	吕正惠	华 玮	刘思谦
	孙 歌	罗宗强	项 楚	洪子诚
	袁行霈	耿占春	钱理群	董乃斌
	童庆炳	詹福瑞		
主 任	傅璇琮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委 员	王晓渔	邓小军	左东岭	叶舒宪
	吕伟民	朱晓海	李继凯	张宏生
	罗 岗	赵京华	贺照田	党圣元
	倪 伟	徐 俊	郭英剑	郭英德
	康保成	蒋 寅	傅 刚	臧 清
	樊善标			
主 编	陈 飞	张 宁		
编 辑	石素真			

目 录

* 名家述学 *

- 我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 罗宗强(1)
释“惟人参之”
——《文心雕龙》识小录之一 罗宗强(7)
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 罗宗强(16)

* 伊藤虎丸小辑 *

- 鲁迅:中日共享的“真的人”
——致中国读者 伊藤虎丸(29)
战后中日思想交流史中的《狂人日记》
——从“学习中国”到“探求共通的课题” 伊藤虎丸著 李冬木译(39)
“战后民主主义”与大学改革
——《鲁迅与终末论》代序 伊藤虎丸著 吕 晴译(50)
精禽梦觉仍衔石
——伊藤虎丸与《鲁迅与日本人》 李冬木(66)

* 学术史观 *

- 东亚视角的可能性
——中日本国文学史叙述的产生、特点及其历史脉络之比较 柳浚弼(76)
文学的历史学
——宋代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及“诗史”说
..... 浅见洋二著 张 剑 易爱华译(102)
“唐宋八大家”研究述要(1949 ~ 1978) 李维新(126)

* 阐释空间 *

- 常规研究与创造力的获得
——以朱光潜写作道路为参照的讨论 贺照田(142)

神祇时代的诗学

——古希腊诗学展开的宗教背景····· 李 平(153)

论开明文化流派····· 姜 建(176)

背叛的政治学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者穆时英的选择····· 铃木将久著 寒 冰译(204)

* 古典新义 *

乐教思想探析····· 夏 静(217)

论宫体诗风的形成····· 傅 刚(232)

蘋蘩日用与道统伦理

——论《儿女英雄传》(下)····· 胡晓真(241)

* 文学与制度 *

台湾儿童文学的制度面分析

——一项比较的观点····· 杜明城(254)

* 文学文献 *

20 世纪词籍汇刊叙录····· 刘 石(263)

CONTENTS

【Expert's Comment】

- My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Luo Zongqiang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ntence “Man, and Man Alone, Follows It”—On Some Small
Questions of *Wenxindiaolong* Luo Zongqiang
Gi Kang's Mood and His Life Tragedy Luo Zongqiang

【Special Topics of Ito Toramaru】

- Lu Xun: “a Real Person” Shared by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People—To Chinese
Readers Ito Toramaru
A Crazy Man's Diar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Japanese Communion of Thought after
the World War Ⅱ—From “Learn from China” to “Search for the Common Studies”
..... Ito Toramaru
“The Democraticism after the World War Ⅱ” and the Reformation of Universities—the
Preface to *Lu Xun and Zhongmulun* Ito Toramaru
The Surprised Bird Awakened from the Dream Still Picks Stones—Ito Toramaru and *Lu
Xun and the Japanese* Li Dongmu

【Views on the Academic History】

-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erspective of Eastern Asia—Comparison between the Forming,
Characteristic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ry History Ryu Jun Pil
Historiography of Literature—Chronology, Chronological Prose & Verse Writings and
“the Theory of Poems as Records of History” in Song Dynasty Asami Yoji
A Brief Account of the Studies on “the Eight Great Prose Writers” (1949—1978)
..... Li Weixin

【Space of Interpretation】

- Regular Study and the Achievement of Creativity—To See the Way of Chinese Present
Study of Aesthetics that Should Be by Taking Zhu Guangqian into Comparison
..... He Zhaotian
The Poetics in the God's Era—The Religious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Greek Poetics	Li Ping
On the Broad-minded Cultural School	Jiang Jian
Politics of Betraying—Mu Shiyong's Choice as a Chinese Modernistic Writer	Suzuki Masahisa

【New Meaning to the Classics】

Approaches to the Thought of Music Education	Xia Jing
On the Forming of the Poetic Trend of Palace Style	Fu Gang
Daily Life & Traditional Morality—On <i>Legend of Heroes & Heroines (II)</i>	Hu Xiaozhen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aiwa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u Mingcheng
--	--------------

【Literary Documents】

The Collective Printing of Books of Ci-Poetry in the 20th Century	Liu Shi
---	---------

(英译:李 亚 李 蕾)

我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

罗宗强

时光流逝,转眼已年过古稀。一生荒废,真正能有机会从事一点学术研究,也就是后半生的事,时间还不到三十年。短短的三十年,能做出什么来呢?就我的研究领域来说,也就是开了个头吧。

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文学思想是研究人们对于文学的看法的。文学的特质是什么?它是功利的还是非功利的?它在社会生活中应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面貌(体裁的探索、风格韵味情趣的追求等),应该如何构成这个面貌(方法与技巧的选择、修辞与声律的运用等)?它的承传关系怎样(应该接受哪些传统、摒弃或者接受哪些传统、文学传统上的是是非非等)?它应该如何发展?它与受众的关系是什么?……研究这些观念的发展史,就是文学思想史的任务。这是一个新的领域。我之所以选择这一研究领域,主要的原因是想更为全面、更为确切地了解我国古代文学观念、文学思想潮流的真实面貌和它的演变过程。过去我们有文学史,有文学批评史,二者是相对独立的。文学史描述文学的发展史;文学批评史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它们有时交叉,但有时也相互脱节。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只研究理论形态的东西,对它作出解释。至于它与文学创作实际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就少有人过问。而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远比我们想像的复杂。同一位作家,他的理论批评和他的创作实际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并不一致,也就是说,其说的和做的不一样。有时候,某一种文学思潮有理论表述,但有时并没有理论的表述,大量的新文学观念是从创作实际中反映出来的。有时候,一种理论主张的提出是当时文学创作倾向的理论概括,但有时某一位理论家的主张在当时并无实际的影响。他的理论表述独立于当时的创作实际之外。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就是为了弄清事实,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实际相结合的研究中,弄清一个时期、一个流派、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观念的真实面貌。

—

我的研究工作的着眼点,首先是历史还原。我努力想知道文学思潮的发展段落,了解每一个发展段落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每一个

时段都有许多的作家,这些作家的创作是不是有一个总的一致的趋向,或者是同时有几个并行的趋向?这又牵连到如何划分段落的问题:在什么时候、在何种条件下文学思潮转变了?要了解这些,就要将存世的能够找到的作家作品全部找来一部一部地读。看他们作品的题材取向、审美追求、技巧特色,特别要注意他们在审美趣味和技巧追求上有没有新的趋势。看他们提出一些什么样的主张,这些主张在当时有没有产生影响,是自说自话,还是一种普遍的诉求。这样一个办法实在又笨又慢,但不这样做,不从自己阅读的实际感受开始,去思索、去对比、去概括,就只能用二手材料,人云亦云,不可能有自己的发现。

但只是读作品也还不够,如何解释一种新的文学思想潮流的产生,又涉及当时的政局、社会生活环境、哲学思想潮流和作家的人生遭际等问题。这就是说,从事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必然是跨学科的研究。当然,我不可能进入到每一个学科里面作深层的探讨。每一个学科都有无数的问题,要深入是做不到的。但是,我必须知道政局的大的环境和它对于作家的影响,我必须知道社会思想潮流的总的面貌和它对于作家的影响,我必须知道当时不同的群落的不同动向。而这些了解必须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去分析某一种文学思想产生的原因、它的特点、它和前后文学思想的关系等等。我的追求是历史实感,尽量地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

这里当然有几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一个是历史还原能够做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我尽量去读所有能够找到的史料,但是存世的史料能够反映的,是否就是当年的真实面貌呢?这是一个大家都在争论的问题。就我接触的文学思想史而言,这一问题有时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材料不足,或材料的真伪难定,都会给历史还原带来困难。比如初盛唐之交的张若虚,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那种全新的审美追求,那种技巧所反映的文学观念,应该有更为完整的呈现。但是他留下来的诗作太少,也没有留下理论批评的片言只语,我们就无法解释当时的全貌。一篇艺术上那样成熟的作品,怎么可能只是一个个别的现象呢?历史曾经发生过而给我们留下的讯息往往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据此很少的一部分材料,我们就很难说我们描述的是历史的真实面貌。而材料的真伪难明,也是历史还原遇到的不易解决的问题。例如,《诗》大序和小序的作者与作年的问题,一时难以论定,究竟是把它们当作先秦的文学观念呢,还是把它们当作汉代的文学观念?朱熹是主张废序的,但从楚竹简的孔子诗论看,序在孔子的时代又似乎存在过,而且似可进一步推测,当时流行的《诗》是不是前后有不同的本子、不同的序。但这只是推测,不能说是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还原遇到的又一个难题,就是古今思维习惯、思维方法的差异常常妨碍我们对古人观念的准确理解。我们不能以古解古,而且以古解古也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就常常对古人的某些文学批评不理解。他们当时评价很高的一些作家,我们今天看来并没有多高的水准;相反,他们评价不高的一些作家,我们今天

有可能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当然是由于观念不同的缘故。这不同的观念,有的他们说了,有的就没有说,只隐藏在片言只语的评价里,有时甚至连片言只语也没有,只是评其等第的高下。对于他们何以要那样评,我们并不了然。但是,他们总有他们的道理在里面。他们的道理何在呢?追索起来是非常不易的事。我们既不可能回到古代,又不能把古人现代化,给古人穿上西装革履。难就难在这里。历史还原遇到的另一难题,是如何处理主观情绪的介入和历史的客观性问题。任何作品的解读,都不可能完全排除解读者的主观因素。主观因素的介入,有时就有可能导致作品的误读,导致文学观念、文学理论范畴的误解。这些困难说明,我们只能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去努力还原历史,我们不可能完全回到历史的本来面貌,但我们又不能离开现有的史料,去造作历史。历史还原遇到的这些困难,常常耗费我大量的时间。我只好从史料的清理入手,尽力去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语境,前后左右比对,去尽力接近他们思想的实际。我在探讨刘勰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时,就在这方面下过不少的力气。

历史还原还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如何处理一个时期、一个流派、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观念的主次问题。一个时期也好,一个流派也好,一个作家也好,他们的文学思想观念常常是多方面的,那么,什么是他们的文学观念的主要方面呢?我们不可能把他们所有的思想观念都加以描述。而即便把他们所有的文学思想观念一一列出,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在长期的文学思想研究过程中,有一些现象处理起来常常让我感到困难。我发现,有一些批评话语、一些理论表述是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的,陈陈相因,了无新意。汉人说了,唐人也说了,宋人说了,清人还是那样说。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那是一些最基本的观念,是传统的承接。但那些观念如果没有新的解释,我们是否还能将它作为一个时期、一个流派、一个作家特有的文学思想观念加以描述呢?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描述那些反映出文学思想观念新的进展的东西,那些多少有一点特色的东西。历史还原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文学思想潮流的演变,是描述发展的脉络。陈陈相因的话语无助于反映这种发展变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一些作家、批评家的随意话语。有一些随意话语有着很有价值的理论内涵,这类话语有时与其时的文学思想发展的总趋势并无多少关系,但在理论建树上有其独特的贡献,对于这类话语,当然可以把它特别地提出来。但是多数的随意话语并无理论的价值,我们就非得把它舍弃,不能巨细毕陈。为了更好地描述主要的东西,我往往舍弃大量已掌握的材料,把可以写八九十万字的材料,只选择最主要的,写三四十万字。我也常常对我的学生说,要竭泽而渔地收集材料,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鉴别、选择和运用材料,要善于找出主要的东西,而敢于把非主要的材料加以舍弃,即使那是一条很好的材料,如果与主要脉络无关,也要毫不吝惜地舍弃。

二

与文学思想的历史还原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士人心态研究。

在写完第一本文学思想史之后,我接着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魏晋是士人心态处于大变动的时代。士人的心态对于文学观念的变化影响至巨。我在写《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时候,虽多少注意到士人心态的变化对于文学思想的影响,但还没有自觉到士人心态研究在文学思想研究中的巨大意义。待到研究魏晋文学思想时,就感到非了解士人心态的变化不可了。1991年,在动手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之前,我写了《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2003年,这本书再版时,我写了一个《再版后记》,把为什么要研究士人心态和士人心态研究可能涉及的问题作了一些说明,现在摘引其中的一部分如下: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的改朝换代,有过许多的大战乱,有过许多的株连杀戮,风云变幻,无时无之。士人或青云直致,或冤死牢狱;或坐享荣华,或转死沟壑;荣瘁更替,仕隐分疏,流光逝水,习以为常。就个人而言,或有惊天动地之经历;而就整个士阶层而言,则大体循传统思想而行事,未见大震撼于士林。只有魏晋和晚明,似乎是两个有些异样的时期。士(或者说是那些引领潮流的士人)的行为有些出圈,似乎是要背离习以为常的传统了。而此种异样,于文学观念的变动究竟有何种之关系,则黯而不明。于是产生了来探讨魏晋士人心态的想法。……

我之所以研究士人心态,只是为了研究文学思想。因此,我的研究对象,是士人群体。我要研究的是士人群体的普遍的人生取向、道德操守、生活情趣,他们的人性的张扬与泯灭。涉及士人个案时,目的也在于说明群体的情况。我要研究的是动向和这种动向与文学观念变化的关系。……

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政局的变化。在古代中国,有隐逸情怀的士人不少,但真正的隐士却不多。隐逸情怀是人生的一种调剂,而真正的隐士却要耐得住寂寞。多数的士人,出仕入仕,因之政局的变化也就与他们息息相关。……

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变化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思潮。我们通常都谈到诸如两汉的儒学一尊的思想潮流、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等对于士人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进行的,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轻重深浅,如何开始,如何了结,似乎就有一连串的问题需要回答。我们可以对这些思潮作义理的细微的辨析,但是它们如何进入士人的内心,变成他们的人生取向,融入他们的感情世界,我们就所知甚少。……

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变化的又一方面,是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生活出

路。现实的生活状况是决定一个人的心境的非常实在的因素。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就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想法。……

当然,影响心态变化的还有其他因素,如家族的文化传统、社党的组合、交往、婚姻状况以至个性等等。但是如果研究一个时期士人的主要心态趋向,恐怕也就只能视其大同而舍其小异。当然,如果是为了研究不同士人群落的心态,又当别论,那就复杂得多了。……

心态研究面对的是人。面对人,就难免有是非褒贬,就难免带着感情色彩。带着感情色彩研究历史,为历史研究者所大忌,说是这种研究容易失去客观性。但是我常常怀疑,即使我们竭泽而渔,广罗材料,能否就可以完全避免主观的介入呢?我们选择和解释史料的过程,就是一种主观判断的过程。……就我自己而言,每当我面对历史之时,是是非非,实难以无动于衷。

这就是我对于士人心态研究的总的认识。我以为,社会的种种因素,比如政局、社会思潮、生活方式、文化氛围等等,它们之所以能够影响文学思想,是通过士人心态来实现的。士人心态是社会历史背景影响文学思潮的中间环节。不了解士人心态的变化,就不易确切地了解一种新的文学风貌、一种新的文学思潮为什么会出现。我目前正在进行的明代文学思想史研究,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不从士人心态入手,解释晚明文学观念的变化就很不容易。

在文学思想史研究中,我特别重视审美感受问题。文学思想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它们都涉及文学的艺术特色问题。对于文学创作实际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离开对于作品的审美感受,是很难把握的。一篇作品好,好在什么地方,如果不去细细地体味,就很难从中分析出它所包含的文学观念。如果把艺术成就差的作品当成艺术上优秀的作品,那就有可能把文学思想的趋向弄错了。我常常对学生说,我们是搞文学研究的,审美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基础,没有审美能力,就会把文学弄成非文学,把文学思想史弄成一般的思潮史,就会把反映心灵历程的这样一个鲜活的学科,弄成一个毫无生命力的学科。当然,文学思想史有相当一部分材料是理论形态的东西,在描述它的发展过程时,也离不开理论的表述。但是,理论的解释和表述,如果没有建立在准确的审美感受之上,它就有可能成为空理论,从空到空。从事文学思想史研究,如何把审美感受、理论思维能力和国学基础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根基大抵较浅,我尤其如此。由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需要打通多个学科,难度很大,要在研究中真正做出成绩,最好是从年轻时开始,一步步扎扎实实地打基础,提高多方面的素养,到头来或许会有所成。我是在快到知天命之年才开始进入这一领域的,虽然到了年过古稀,也未敢一日懈怠,但还是深感力所不及。我是边学习、边补课、边研究的,可以说是一种夹生的研究。虽气喘吁吁赶路,

精疲力竭,欲罢不能,而离目的地却还是十分遥远。

【作者简介】罗宗强,1932年11月生,广东省揭阳县人。1956年入南开大学中文系。1986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明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论学会顾问、《文学遗产》杂志通讯编委。出版有《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等专著十多种;发表有《中国古代诗歌风格论中的一个问题》、《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等论文数十篇。

释“惟人参之”

——《文心雕龙》识小录之一

罗宗强

1909年李详在《国粹学报》发表《文心雕龙黄注补正》，1920年杨鸿烈在《晨报副刊》发表《文心雕龙的研究》，近一个世纪以来研究《文心雕龙》的论著之多，实在令后来者望而生畏。仅大陆而言，论文一千八百余篇，专著五十余部；加上港、台与国外的同类论著，数量就更大。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了。虽然如此，由于这部巨著义理之精深，表述之藏珠隐秀，至今对它的解读，疑问又似乎比比皆是。兹就偶读所得，札记一二，以就正于方家。

—

《原道》开篇叙及道之文之后，有这样一段话：“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此段意欲由天文而及人文，谓人而有文，乃自然而然之道理。人之所以有文，是由于聚性灵、参天地所致。聚性灵、参天地，便成了理解这段文字的要点所在。

多数《文心雕龙》的注释，都未对“惟人参之”作出解释，如黄叔琳注、李详补注、范文澜注、杨明照校注拾遗。这些《文心》的重要注释者，似都认为此句不必加注而其义自明。然事实上并非如此。学者们对此句之理解其实是存在差异的。

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的解释是：

参，既有三义，也兼有参入义。^①

“参”的“三”义，应读为 sān；而“参”的“参入”义，应读为 cān。既两义并存，读音将如何处理？

持两义并存的，还有詹锳《文心雕龙义证》。詹注“惟人参之”谓：

《荀子·王制》：“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杨倞注：“参，与之相参，共成化育也。”《礼记·孔子闲居》：“三王之德，参于天地。”郑注：“参天地者，其德与天地为三也。”《中庸》：“可以赞地之化育，则可

^① 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第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与天地参矣。”朱注：“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汉书·扬雄传》上：

“参天地而独立兮。”注云：“参之言三也。”之，指天地。^①

按：此处“之”非代词，谓其“指天地”，大误。此是题外话，且不论。詹注未说出自己对“参”的理解，然从引文可以了解，他是从“相参”与“三”两义解释“参”的。杨倞解“参”为“相参”，“相参”是等齐、并列的意思，此义“参”应读为 cān。郑注、朱注、颜注“参”应读为 sān。持两义并存的，就我所见，还有两种注译本，不再赘举。

更多的学者则释“参”为“三”，如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注称：“参，三。”译称：“只有人和天地相配。”^②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论》此句直解为：“惟人生于两大之间……与天地并立为三。”^③龙必银《文心雕龙全译》注谓：“参，三。”^④

也有学者释“参”为“加上”、“相参”者，如赵仲邑，在他的《文心雕龙译注》中“惟人参之”一句未作注，语译是连同“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一起意译的，为：“后来加上了集中表现聪明才智的人，与天地并列为三。”^⑤他似是用“与天地并列为三”来译“是谓三才”，那么，“加上了”就是译“参”的了，意为人加入进去。作此解释的还有王礼卿，他译“参”为“相参”。^⑥《中国古代文论选注》：“参，参入……惟人参入天地两仪之中。”^⑦

也有的学者对此“参”字未作明确的诠释，如陆侃如、牟世金合著《文心雕龙译注》“惟人参之”一句未出注，语译与“性灵所钟”连译，为：“后来出现钟聚着聪明才智的人类。”^⑧向长青于此句亦未出注，语译亦与“情灵所钟”连译，为：“由于天地灵气所钟，产生了人。”^⑨因“参”义未明确指译，难以判断其作何种之理解。

这样，在我们面前，“惟人参之”的“参”就有三、等齐、加入等解释。以“三、等齐、加入”释此“参”字，于理虽可通，但若考察《原道》全篇之论述意向，则又似有未尽如人意者。彦和谓天地有文，人参文，人亦有文，故《赞》谓：“天文斯观，民胥以效。”这“天文斯观，民胥以效”，乃是彦和论天文、人文之基本观点，人文乃仿效天文而来，是则论述天地有文采之后，论人亦有文，仿效的意义自亦不言而在其中。

①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② 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第19页，中华书局，1980。

③ 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论》，第16页，“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2。

④ 龙必银：《文心雕龙全译》，第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⑤ 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第21页，漓江出版社，1982。

⑥ 王礼卿：《文心雕龙通解》，第12页，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

⑦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中国古代文论选注》，第16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⑧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第4页，齐鲁书社，1981。

⑨ 向长青：《文心雕龙浅释》，第3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这样,“惟人参之”就存在着另一种解释,即:人仿效天地。参,参拟,模拟,效法。

二

对“惟人参之”之此种理解,其实涉及到刘勰思想的一种历史渊源。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一种以人比类天地的观点。关于此种观点,钱钟书先生曾略论及,^①今且更申而言之。

以人比类天地,属于复杂的天人关系问题中的一个层面。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由于涉及的面太广,本文不拟综论。本文要追索的,只是以人比类天地这一思想层面上的一些问题。

从思想发展的脉络考察,以人比类天地,大抵可分为比象与比德两类。

比象说的最初思想,似是从有关本体的哲学思考发展而来的。它的初始形态,只是说万物一体,还没有进入比类的阶段。《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说的“人”,不是指某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类的概念。“法”,以之为则。王弼注说:“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②法地、法天、法道,最终是法自然,也就是不违万物的本然状态(后来《庄子·秋水》把这一思想表述得既明确又形象生动:“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人法地,就是不违背地之本然状态。这种思想可能源于早期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对于自然的依赖,就不能违背自然的生生之理。《逸周书·文传》:“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卵不蹶,以成鸟兽之长。畋猎准时,不杀童羊,不夭胎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骛,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③依于事物之本然而不要人为地破坏它,强调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思想发展到庄子,就走向了万物一体。道通为一,从空间上说,有无、彼此均相对而存在,本就无须区分;从时间上说,死生存亡亦均相对而存在,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亦不区分,最后就从物我一体走向物我两忘。这当然不必再强调“法”的问题。似乎可以说,老子的“人法地……”的思想,到庄子就变成了人融入自然,人消融进自然中,泯一无我了。

但也正是这种万物一体、万物一气的思想,提供了比象说的基础。这种思想的一种发展,便是从本体向具象,从法则向比类转移。《文子·十守》:“头圆法天,足

① 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第506~507页,中华书局,1979。

②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见楼宇烈《王弼集校释》,第65页,中华书局,1980。

③ 《逸周书》,四库全书本。